

# 耦耕集

文化语言学存稿

游汝杰 周振鹤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游汝杰 周振鹤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· 桂林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耦耕集：文化语言学存稿 / 游汝杰，周振鹤著。

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495-5219-1

I. ①耦… II. ①游… ②周… III. ①文化语言学—文集 IV. ①H0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04958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  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）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（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：524002）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10.625 字数：235 千字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审图号：GS（2013）2852 号 定价：3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前　　言

这本集子的上编是我们在撰写《方言与中国文化》一书前后聚首讨论文化语言学时所写的一系列论文，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学术思想发展的路径，加之其中有些内容在该书中未有体现，所以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好意，将其结集出版，以待学界之批评。本集的下编则是游汝杰个人已经发表，但尚未结集的有关“文化语言”的论文与译文，编在一起以便读者审评。这些论文是多年前撰写的，其中有些观点现在看来也许不甚妥当，但这次结集未做任何修订，以见当年的心路历程。

作者谨识

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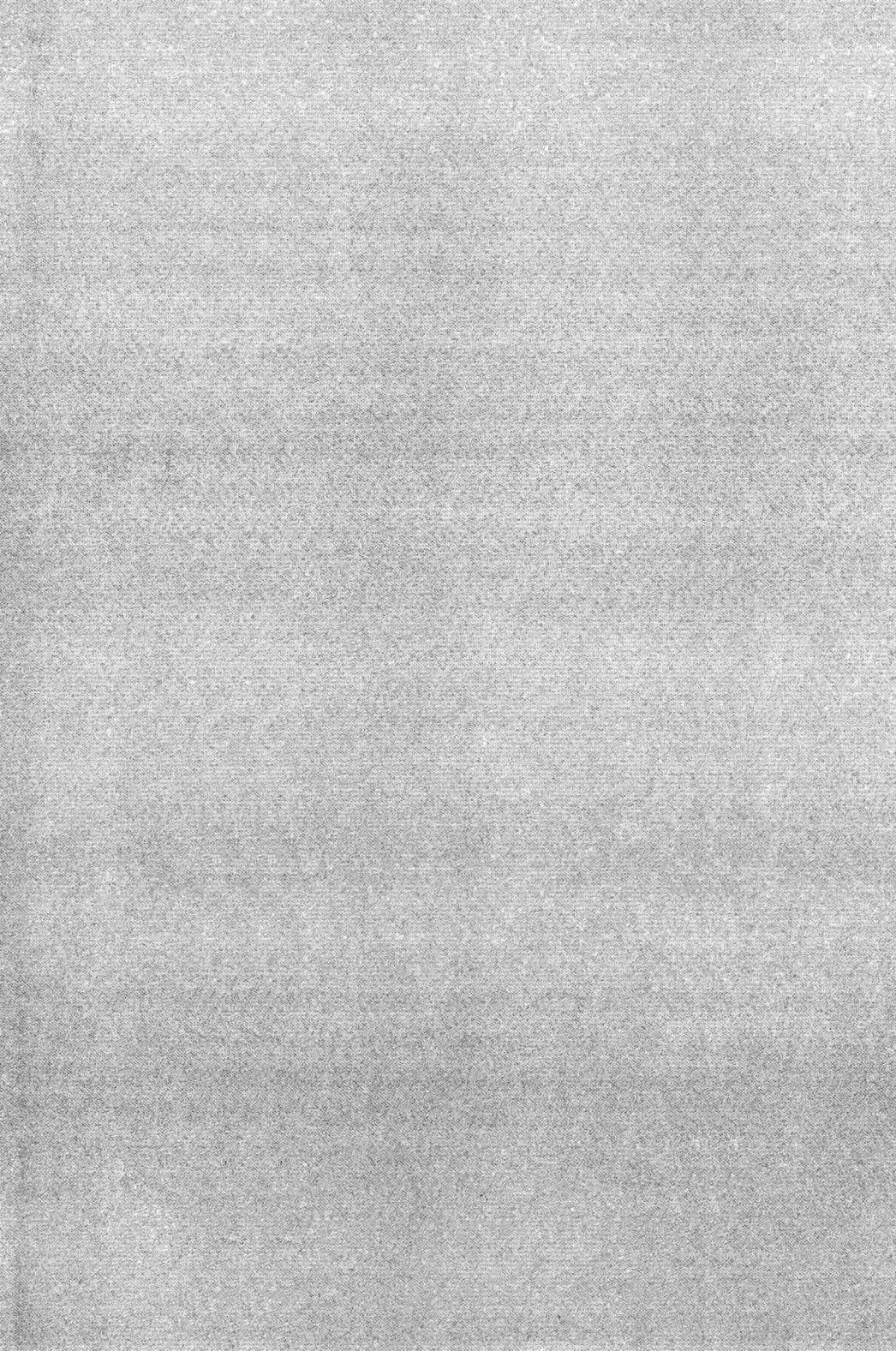
## 上编

- 3 古越语地名初探  
——兼与周生春同志商榷
- 10 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  
——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
- 34 方言和文化史研究
- 48 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
- 81 方言与中国文化
- 97 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
- 117 方志所见上海地区 16—19 世纪方言地理
- 134 南方地名分布的区域特征与古代语言的关系

## 下编

- 161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
- 184 文化语言学答疑
- 191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
- 205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
- 217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
- 283 罗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闽南话—西班牙语词典  
——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
- 304 从合逊《广东对话》看 19 世纪中叶广东的语言、文化和社会

上 编



---

# 古越语地名初探

## ——兼与周生春同志商榷

周振鹤 游汝杰

---

周生春同志在 1979 年 1—2 期《杭州大学学报》上发表的《姑苏考》一文，考证了姑苏即今苏州的苏山，这是正确的。但他立论的基础是训“姑”为“山”，值得商榷。我们认为“姑”字在此只是发语词，没有实义。所谓“齐头式”地名，可分成倒置式和前加式两大类。周生春同志认为姑苏是倒置式，我们认为姑苏是前加式。本文试对江浙一带（包括江西和安徽的部分地区）的古越语地名作些探讨。

据史籍记载，先秦时代江浙闽粤一带为百越所居地。又据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、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和《说苑·越人歌》的有关记载，可以窥测古越语和华夏语是距离很远的。先秦时代江浙一带的地名原是用古越语来命名的，春秋以后始见于文献记载，当是华夏族用华夏语言同音字所记。研究这一带地名必须有以下三个出发点：第一，这些古地名的音义都来源于另一个部族语言，同一地名往往用音近的不同汉

字来记录；第二，不能站在汉字的立场上望文生义；第三，自有不同于汉语的特点。但汉代以来，人们对这些地名往往囿于汉字，望文生义，妄加解释。如无锡，应是古越语前加式地名，“无”是发语词。但是王莽篡汉后却改“无锡”为“有锡”，误把这个“无”字当作“有无”之“无”。

江浙一带的齐头式地名都属前加式。现将这类地名及其冠首字举例如下(限于汉前)：

句(勾同)：句章、句容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、句甬东(即甬句东，《吴越春秋·夫差内传第五》)、句无(又名句乘，《国语·越语上》)、句注山(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)、句余之山(《山海经·南山经·南次二经》)

鸠：鸠兹(《左传·襄公元年》)

姑：姑苏(《国语·越语下》)、姑熊夷(《国语·吴语》)、姑蔑(或作姑妹，《国语·越语上》)、姑末(《吴越春秋·勾践归国外传第八》)。

于：于越(《春秋·定公十四年》)、于潜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

乌：乌程、乌伤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

余：余暨、余干(或余汗)、余姚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、余杭(《绝越书卷二》)

无：无锡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

莞：芜湖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

夫：夫椒(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)

这些古越语地名是用汉字记录的。古代汉字多通假之例。这些地名的冠首词也多互相通假，可以归并。以上九个冠首字的上古音，从韵母来看，属于鱼部的有：于、余、无、莞、姑、乌、夫；属于侯部的有句、鸠。鱼、侯是邻韵，可以相押的

地方很多，故可相通。从声母来看属于见母的有姑、句、鸠；属于影母的有于、乌；属于于母的有余；属于明母的有无、羌；属于滂母的有夫。综上所述，可以把姑、句、鸠归并为一类，因为韵母则鱼侯相通；声母则均属见母。可以把于、乌、余、无、羌、夫归并为另一类，因为韵母则均属鱼部；声母则又可分为两小类：属于喉音的影母和余母，属于重唇音的明母和滂母。喉音和重唇音似乎距离较大，但是从吴方言中保留古音较多的温州话来看，于、无、羌、余同音，即[vu]，夫则读[fu]，区别仅在于重唇和轻唇。因为古越语音值不可稽考，暂用汉字“句”代表第一类冠首词，用“于”代表第二类冠首词。

“句”类词和“于”类词都是发语词，并没有实义。古越语多发语词，东汉人服虔说：“吴蛮夷，言多发声，数语共成一言。”<sup>[1]</sup>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：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勾吴。”颜师古注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句，音钩。夷俗语之发声也，亦犹越为于越也。”勾吴即是吴，于越即是越。句、于是没有实义的发语词。这两类词不仅见于地名，也见于人名，如句践、句亶、余善、余祭、余昧、夫差、夫槩、无余、无壬、无暭无疆。现代吴方言在单音节人名前也加发语词，如阿根、阿土。其结构模式跟古越语同。如寿梦两个儿子的名字余祭和余昧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阿祭、阿昧。

现将上述地名冠首字的发语词性质分别加以考证。

**句。**在出土的铜器中，吴器有吴王光逗戈，攻敔王光戈，攻吴王夫差鉴，攻吴王夫差剑，工歟王钟，工歟太子姑发胥反剑等。敔、歟是吴字之通假，攻、工是勾字之通假。吴(敔、

[1] 《世本·居篇》注。

巩)字前可加勾(工、攻)字,也可不加任何字,可见勾(工、攻)无实义,是发语词而已。又,出土“越王鳩浅剑”,勾践作鳩浅,可见勾、鳩亦可通假。字面的意义和所记的客体没有联系。《左传·哀公二十二年》:“越灭吴,请使吴王居甬东。”《国语·越语》则将甬东记为甬句东。可见句字可有可无。另有句甬,得名于甬江,句字亦属虚义。

**姑和诸。**郭沫若同志释《姑冯昏同之子句罐》铭文,认为“姑冯昏同”即越王句践时的大夫冯同<sup>[1]</sup>。姑字可省,可见属虚义。姑苏后世称苏州,姑亦省去。上述“工巩太子姑发腄反剑”,郭沫若、商承祚等同志考证为吴王诸樊之剑。铭剑者当时为寿梦太子。商氏拟“姑”为“诸”则不仅姑为虚义,“诸”亦类之。再者,《国语·吴语》载:“大夫种乃献谋曰……越王许诺,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。”再看《国语·越语》对同一件事的记载:“大夫种进对曰:‘……’。勾践曰:‘苟得闻大夫之言,何后之有?’执其手而与之谋,遂行成于吴。”可见献谋者,行成于吴者均是大夫种,亦即诸稽郢。两名同指一人,快读为种,慢读为稽郢。至今闽南话“种”读[tɕin],犹是稽郢之合音。至于“诸”很明显仅是发语词,有无不影响意义,故可省去。“姑”和“诸”实唯一字。《世本·居篇》注曰:“姑之言诸也,毛诗传读姑为诸。”这样看来诸暨也属此类地名。

**于。**《竹书纪年》称越为于粤(越、粤通假):“晋出公十年十一月,于粤子句践卒。”<sup>[2]</sup>但是出土的“越王鳩浅剑”、“越王者旨于赐剑”、“戊王州句剑”等越器铭文均作越不作于越,于字因属虚义而省去。于潜亦可省称为潜。《吴越春秋》:

[1] 郭沫若: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“越器·姑冯句罐”。

[2] 商承祚:《“姑发腄反”即“诸樊”议》,载《中山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63年第3期。

“秦徙大越鸟语人置之晉。”晉即丹阳郡的于潛县。又，《水经·浙江水注》曰，于潛“因县境晉仙而得名”。

**烏**。于、烏同音，至今浙南吴语皆然。西汉会稽郡有烏程县、烏伤县，后人多望文生义，强解烏程因烏氏程氏所居而得名。而烏伤之解则更荒谬，据云乃烏（鴟）口皆伤之意<sup>[1]</sup>。其实此两地只叫做程、伤而已，加“烏”以发语。至今闽南晋江一带，仍以“烏”[ɔ:]作发语词用于单音节人名之前，如烏海、烏珠，对不知其名的人当面可叫“烏个[ɔ:ε]”。在这里“烏”不作“黑”解（闽南话称“黑”为“烏”），用法与厦门话、粤语、吴语的“阿”，福州话的“依”相同，用于发语，带爱称意味。浙北以“烏”字起头的，地名很多，如烏风山、烏带山、烏戎山、烏胆山、烏午严、烏蜀山、烏巨山等。

**余**。“余”字非古汉语地名用字。含“余”字地名有西汉豫章郡余汗县（或作余干，地在今江西省余干）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载淮南王安上武帝书谓“越人欲之变，必先由余干界中”。可见当时越人曾分布至赣东北，“余干”必是越语地名。浙北的余杭、余姚、余暨更是越人所居地，也当是越语地名，秦汉不过用汉字记其音，而沿用其名。汉会稽郡的余暨，东汉人应劭认为是“吴王阖闾弟夫槩所邑”<sup>[2]</sup>，当必有所据。因为是夫槩之城，故以暨名之。余、夫两字都只有虚义，所以暨字不变，夫字换为余字，仍可表暨领有之地。余姚得名于姚水。余杭的“杭”来源未详，有人训为航，恐未必然。后世杭州、姚州均省去“余”字，可见“余”无实义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冬……大败吴师，获其舟余皇。”余皇是吴先王所乘

[1] 《史记·句践世家·索隐》。

[2] 《汉书·补注·会稽郡》。

之舟。可见“余”不仅可以前置于地名、人名，还可以前置于物名，仅起发语作用而已。江浙一带以“余”字冠首的地名还有余不、余瞿、余渔、余英、余支等。

**夫。**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：“春，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。”杜注：“夫椒：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。”夫椒得名于椒山，原无“夫”字，“夫”无实义可知。

**无。**越王中称无某的颇多，传说中越国始祖叫无余。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吴越春秋》所载越王名有：无任、无蹠、无阻、无余、无颛等，直至汉代，闽越王中犹有号无诸者。近人罗香林认为古越人命名不避祖讳，并训“无”为“王”<sup>[1]</sup>。这种看法未必确当。“无”即训为“王”，为什么其他越王名也有不含“无”者？况且地名中的“无”字又显然不能释为“王”。其实古越语地名、人名乃至物名有一种一致性，即用些发语词冠首，如上述的姑、夫、句、余均是。其用法可与英语虚词相类比。“无”当类此。“无”如训为“王”，则不能解释地名，如训为有无之“无”，又不能解释越王名，只能解释为发语词才妥切。无锡既不是“其地无锡”，也不是“锡王”。无锡乃越语，“无”是词头，“锡”另有越义。后人不知其所由来，妄加解释，或说其地本产锡，至汉锡已采尽，而名无锡，或说“后汉有樵客于山（指锡山）下得铭云‘有锡兵，天下争，无锡宁，天下清’”，皆无稽之谈。

通观上文所作考证，可知周生春同志训姑苏之“姑”为“山”是不对的。请再以四证补充之。第一，江浙一带古越语地名的一条规律是齐头式地名只有前加式，即以发语词冠

[1] 罗香林：《古代越族文化考》，录自《百越源流与文化》，“国立”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5年12月出版。

首，未见有倒置式地名。如依周说，则姑苏为倒装式地名，这不符合一般规律。第二，如依周说，无法解释人名中的“姑”字。第三，姑蔑之类地名可以省称为蔑，如训为山，则姑字不可省。第四，依周说，姑是岵的通假，含山义，则姑是汉字汉音。那么姑灌、姑射、姑逢、姑兒中的“姑”字含山义已极为明显，但是《山海经》却作：“姑灌之山、姑射之山、姑逢之山、姑兒之山”，《山海经》不至画蛇添足至于此。姑苏乃越语地名，“姑”是发语词，“苏”另有他义，不可以汉字汉义强解之。

以上研究仅限于江浙一带古越语地名。古代百越分布的范围要广阔得多。臣瓚曰：“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，百粤杂处，各有种姓。”<sup>[1]</sup>他们的语言应该有某种一致性，以各地同类古地名有待进一步整理和研究，这里不赘。

原载《复旦学报》，1980年第4期。

---

[1] 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。

---

# 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

## ——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

游汝杰 周振鹤

---

### 引 言

语言是历史的产物。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移民和政区沿革是这些因素中两个重要的方面。换句话说，方言地理与移民史和历史行政地理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谁都知道客家方言是西晋末年以后几次大规模移民的直接后果。虽然对移民与方言的关系至今还很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，但是无论是历史学界或语言学界都承认这种关系有重要的意义。然而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却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。虽然西方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：方言分区界线有可能与政治疆界相一致，但也从未有人借助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进行方言分区。

方言地理学历来使用“特征判断法”划分方言区域，也就

是以表示方言特征(包括语音、词汇、语法)的“同言线束”,作为方言分区的界线。但是同言线有时并不重合或密集成束,而是十分离散,甚至犬牙交错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分区界线,难免失之偏颇。如根据麻韵(开口二等)今读[a]这条同言线,金华和杭州同属一个方言区,但是如果以古寒韵(见组)今读[ɛ]这条同言线为准,金华和杭州又要分属两区。因此特征判断法可行性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。

有些西方学者因此干脆走向取消主义,认为方言之间并不存在疆界,划定方言边界的企图是徒劳的。事实上,一般人光凭听感都可以得出结论:吴语和闽语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方言区的;就是在闽语内部,福州话和厦门话也分属两个更小的方言区,如此等等。问题在于方言的疆界比较模糊,简单地、机械地运用西方传统的“特征判断法”,往往不能科学地划出边界。我们应该综合考虑方言形成的历史原因、文化背景和方言本身的特征,另辟蹊径,寻求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方法。

笔者最近在探讨吴语分区问题时,发现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,可以用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作为吴语内部分区的基础。本文以浙江省为例,首先阐述其政区沿革过程,分析其与方言分区产生一致性的历史原因,然后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以历史政区作为方言分区基础的切实可行性。